

周宁 著

世界是一座桥

Shijie
shi yizuoqiao

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建构

世界文明的进程是一个多元发展、相互作用的系统进程，形成创造于跨文化或文明之际的“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中。

笔者以世界的现代化为立足点，

重整世界文明史中的中国文化遗产与活力。

尤其强调的是中华文化对世界现代文明的贡献，包括它对西方现代化与东亚现代化的影响。

为我们今天创建国家文化

形象提供资源与信念基础，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的。

综合国力竞争表现在“硬国力”与“软国力”两个方面。“硬国力”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与科技实力。

“软国力”则指一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

作为“软国力”的国家文化形象已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指标。

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倡创建国家文化形象，不仅要认清当今局势，思考发展策略，还应该清理历史遗产并发掘这份伟大遗产。

在现代化历史中找回

我们一度失落的文化信心，在全球化大趋势中

使往昔的光荣

现在的梦想变成未来的事实。

2007

世界是一座桥

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建构

Shijie Shi Yizuoqiao
Zhongxi Wenhua de Jiaoliu yu Jiangou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是一座桥：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建构 / 周宁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

ISBN 978-7-5633-6522-7

I. 世… II. 周… III. 文化交流—中国、西方国家
IV. G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000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18.25 字数: 190 千字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4 000 册 定价: 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简 介



本书在世界背景下探讨中西文化关系中的一些重要而有趣的问题。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是什么？中西交通史上动人的故事如何发生又为何被遗忘？在不同民族国家竞逐富强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谁称霸海洋谁就称霸世界，失去海洋的民族也将失去家乡。郑和或郑芝龙，谁是真大英雄？西方与中国，遭遇与冲突，彼此之间的认识与想象，有多少理解与谅解？又有多少误解与曲解？重温过往的苦难与光荣，是我们追求幸福和平的方式。

作者简介

周宁，博士，厦门大学闽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系主任。

责任编辑＝

汤文辉

刘云霞

装帧设计＝

刘 凇

序

中国转动世界

布罗代尔提出:现代世界是一个由不同国家、民族,不同力量在不同领域的相互创造生成的系统,离开了这个系统,任何所谓普遍有效的假设,诸如理性或进步、自由,都不足以成为历史的尺度。本文试图在宏观历史视野中探讨中国在世界文明史上的文化影响。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华夏文化圈与西方文化圈内,贯穿着整部世界文明史。公元第一个一千年里,中国文化创立了华夏文化圈,文言文、儒家思想、家族与政治伦理、太学与科举制度、统一货币、土地制度与税制等在整个东亚与东南亚部分地区一体化。公元第二个一千年里,中国文化转动世界,不仅启发了西方的现代化,而且准备了东亚现代化的文化资源。中国自身也在经历了衰落与磨难之后,终于在第三个一千年开始的时候迎来了伟大的复兴,并昭示了西方模式之外的世界现代化的另一种模式。

世界文明的进程是一个多元发展、相互作用的系统进程,形成、创造于跨文化或文明之际的“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中。笔者以世界的现代化为立足点,重整世界文明史中的中国文化遗产与活力,尤其强调中华文

化对世界现代文明的贡献,包括它对西方现代化与东亚现代化的影响,为我们今天创建国家文化形象提供资源与信念基础。

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的综合国力竞争,表现在“硬国力”与“软国力”两个方面。“硬国力”指一个国家的经济、军事与科技实力,“软国力”则指一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作为“软国力”的国家文化形象,已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指标。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倡创建国家文化形象,不仅要认清当今局势,思考发展策略,还应该清理历史遗产并发扬这份伟大遗产,在现代化历史中找回我们一度失落的文化信心,在全球化大趋势中使往昔的光荣、现在的梦想变成未来的事实。当真像沃勒斯坦所预言的那样:21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让位于另一种或几种后继的体系,而“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将会在决定人类共同命运中起重大的作用”。^①

—

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东征到兴都库什山,在今阿富汗建立了“极远的亚历山大城”,此后的希腊化时代,从地中海到伊朗高原,以亚历山大里亚为中心形成了一个相对一体化的世界。一个世纪以后,秦始皇统一六国,书同文、车同轨,华夏九州也成了—个政教、文物一体化的世界。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是从大、小兴安岭一直到喜马拉雅山的一系列横贯中亚、辉煌隆起的大山,像一道由雪峰与高山森林树立的天然长城。只有那些险隘的山口,维持着两个世界间微弱的交通。马其顿帝国在瞬间建立又在瞬间破裂,罗马帝国继承了它的西半部,安息骑兵杜绝了他们东扩的幻想。中华帝国延续下来,由秦入汉。大汉帝国的天下向西北扩张,一直

^①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2页,尤来寅、路爱国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到中亚,两个世界的交通从“丝绸之路”开始,长安到罗马。然后就是漫长的 20 个世纪。罗马帝国分裂之后,再也没能在旧址上重整。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其间虽有阶段性的分裂动乱,但广土众民、天下一统,不仅是一贯的理想,也是现实中的常态。

从张骞出使西域到马戛尔尼出使中国,这 20 个世纪,是“世界走向中国”的时代。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是纪元前后世界的两个中心。

秦汉帝国的版图约为 390 万平方公里,罗马帝国的版图约为 450 万平方公里,但秦汉帝国的可耕地面积却是罗马帝国的八倍。秦汉帝国的农业优于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贸易可能比秦汉帝国兴盛。两个帝国都在修筑宫殿、城市、帝国大道,将帝国军队派往边境征服那些觊觎帝国财富与土地的“野蛮人”;两个帝国都试图在自己的版图上建立共同的价值与信念基础、共同的语言文化传统与统一的政治经济制度;两个帝国都曾创造过稳定的政治、富足的经济与繁荣的文化;两个帝国也都先后陷入分裂与战乱。伟大的笈多王朝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将印度变成世界的中心。他们吃的最好(大米与结晶糖)、穿的最好(棉布),他们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数学头脑,他们的战士骑在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大象)上征战,他们的水手在从印度洋到地中海的广大海域上航行,正是借着如此强大的国力,他们的高僧来到中国,用佛教武装灾难中的中国人的精神。

如果说秦汉帝国只是当时世界的两个中心之一,盛世大唐则是世界的中心。罗马帝国衰败以后,便再也没有复原,秦汉帝国的遗产则被完整地继承下来。三个世纪的战乱之后,隋唐重新统一了中华。在秦汉帝国的版图上重建了一个胡汉混血、梵华同一的世界帝国。

长安是世界之都,宫墙御道、街市佛寺,东西十公里,南北八公里,比我们今天看到西安城墙圈出的地界大得多。四邻藩邦归附贡献,万里商贾远来贸易——

波斯的流亡公子贵族、大食的药材宝石商人、日本的留学生、东非或爪哇的“昆仑奴”,居住在同一座都市里;

康居、吐蕃的马匹、皮毛,阿拉伯的鸵鸟、没药(茴香),天竺的孔雀、白莲花,波斯的铜器、树脂,林邑的大象,爪哇的犀牛,拂菻的水晶玻璃,高丽的纸,陈列在同一处市面上;

佛教徒、道教徒、景教徒、摩尼教徒、拜火教徒与前来避难的伊斯兰教徒在毗邻的寺庙里礼拜。

长安是帝国之都,有世界胸怀与气象。阿富汗人与叙利亚人骑着波斯战马在大唐军队里服役,近十万大食番商则在广州城里居留。广州、扬州是市民的城市。波斯舶、大食舶、昆仑舶,停在城外珠江江面上,暖风温润,夹着岸边荔树黄花的芬芳与居家沉醉的人烟味儿;扬州位于长江与运河交接处,比广州更近于帝国中心也更繁华,歌台舞榭,胡姬当垆。

大道如青天,李白仗剑远游的那些年里,中国就是世界。

大唐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其文治武功,影响西到印度、波斯,东及朝鲜、日本。西北天然屏障的大山被超越,征战、和亲、纳贡、贸易曾经将大唐势力远播到吐蕃与波斯,直到“安史之乱”,才中断了大唐国力向西北的扩张。当然,大唐文化的同化力量在西北远不如在东南成功。新罗王国统一朝鲜三国,国家律令格式都遵循唐制,国王武烈王金春秋曾经出使盛唐,开始在新罗推行儒学,信奉儒家思想与佛教,在官方与上流社会使用汉字,并模仿中国文学,新罗时期最有成就的文学家崔致远不仅赴唐留学,而且在唐中举、为官,汉语诗文写得出神入化。通行的汉语书面语成为华夏文化圈的基础。

中国文化对东亚广大地区的同化影响,到唐代已基本确立。日本遣唐使一批一批来到长安,将中国的典章制度带回日本,开始了一系列以唐朝律令为典范的政治改革。日本历史上有两次大的“革新”,19世纪的“明治维新”是“全盘西化”,7世纪的“大化改新”是“全盘中化”。奈良时期最著名的“万叶歌人”山上忆良,曾经作为日本遣唐使的随员来到中国。他为自己的长歌写的大序,都是地道的骈体汉文。日本遣唐使历时两个世纪,平安时期中国文化在日本已经根深蒂固了。中国的文学艺术、宗教

哲学、政治思想在日本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精英文化,像朝鲜一样,建立在汉译佛经基础上的汉传佛教,也成为日本的国教。

中国文化在东亚传播同化,由中国而朝鲜、日本,越南而南洋诸岛,华夏文化圈到唐代已基本形成。越南很久以来就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大唐疆域的南界已经深入,北越基本上是汉化地区。李朝建立,尊崇儒学,开科取士,以汉文为通用语文,将中国的制度与法律、文字与文学全盘搬到越南。曾经的“华夏化”与目前的“西化”或“现代化”,是同类概念,它包括语言、思想、制度、器物等不同层次的同化过程,一体化的文言文、儒家思想、家族与政治伦理、太学与科举制度、货币土地制度与税制,等等。

公元第一个一千年,整个东亚与东南亚部分地区都经历了一个“华夏化”的文化同化过程,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超越政治国家与民族、超越战争与敌意的“华夏文化圈”。礼制天下、世界大同的儒家思想,为这个文化圈奠定了普世主义理想;汉字为这个文化共同体提供了语言基础;建立在儒学科举、唐朝律令、汉传佛教基础上的共同的政教制度,为这个文明类型创立了统一的制度体系。此阶段中国文化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一个代表着当时最先进文化的“华夏文化圈”。

二

唐宋中国五百年,不仅是中国文明自身历史的巅峰,也是同时代世界文明的巅峰。我们在器物、制度与思想三个层次上理解文化的概念。一个国家强大了,其文化国力自然会影响并塑造其他国家与地区。不管是卡尔·马克思的理论还是马克斯·韦伯的理论,不管是大唐中国还是今日美国,国家强大,文化国力就会自然溢出国界。国家的文化国力是个跨文化概念,我们在跨文化的公共空间中清醒地清理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希望能够为我们民族的复兴发掘文化资源。

英国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曾说：所谓世界通史，我的理解是，它不同于所有各国家的历史的组合，不是一盘散沙，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不是记忆的负担，而是启人心智的智慧。它贯通上下古今，各民族的历史在这之中只起辅助说明的作用。各民族历史的叙述，不是根据它们本身的情况，而是根据它们同更高的历史发展过程相关联的程度来决定，即根据它们对人类共同的财富所作出的努力的时间和程度来决定。^①

中国的文化国力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公元第一个一千年，形成了覆盖整个东亚、远播南洋与塞北的华夏文化圈；二是在第二个一千年，启发了西方的现代文明，并完成自身从相对的衰落到由边缘而中心的复兴。

汉唐中国，从世界的中心之一到世界的中心。千年帝国持久的文化影响，不仅在东亚塑造了一个地域广阔的华夏文化圈，而且将文明的种子远播到连当时的中国人都无法想象的地方。

恒逻斯战役(755)之后，中国工匠流落到中亚、西亚，不久造纸术就由西亚传播到西班牙。1150年，西班牙出现欧洲第一家造纸厂。

宋人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至少在13世纪，朝鲜已学会用金属活字印刷朝文书籍。又过了两个世纪，德国人古滕堡才用活字印刷出欧洲的第一本书《古滕堡圣经》。

宋朝军队曾用火药打败金人，蒙古军队围攻开封，守城金军用的“震天雷”，可能是原始的火炮。13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罗杰斯·培根曾将火药的秘密配方用暗码记在自己的书里。1326年，佛罗伦萨市政会宣布了造炮的命令，同年德·米勒梅特作的爱德华三世画像上就出现一门金光闪闪的铜炮。

^① 转引自张广勇为《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写的导言，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38页，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梦溪笔谈》详细说明了指南针在风水术中的应用,《萍洲可谈》、《梦梁录》中记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隐晦则观指南针”。三个多世纪以后,葡萄牙亨利王子的舰队装上了磁罗盘与船尾舵。地理大发现开始,西方进入现代文明时代。

英国著名哲学家弗朗西斯科·培根在《新工具》中写道:“……印刷术、火药和磁铁。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①

如果说盛世大唐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宋元中国则是转动世界的轴心。大唐衰败之后,阿拔斯王朝曾经一度独领世界风骚,《一千零一夜》里著名的哈里发哈伦·赖世德统治下的巴格达变成世界之都。但是,很快,中华帝国又在故土上复兴了。唐强宋富。在西方的现代化之前,宋代中国是世界上最“现代”的国家。人口增长快,社会规模大,文官制度确立,城市发达,经济市场化,技术先进……

宋代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它有最完善、最有效的文官制度,有最大的城市与最大规模的贸易,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17世纪最博学的英国人培根对那些改变世界的发明“的起源……模糊不清”,20世纪他的同胞李约瑟用毕生的精力研究中国科技史,证明那些伟大的发明都来自宋代中国。然而,幸福到苦难的转化往往在一瞬之间。蒙古征服对西方来说是个发展的机会,对中国却是灾难。随着蒙古大军,从中亚到南欧的冒险家、商人、传教士,或赶着骆驼骑着马,或乘季风航船,涌向大汗的国土——中国。中国是世界财富的源头,人们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洗劫或贸易,或洗劫式贸易,财富又源源不断地从中国流出,丝绸之路一线海上与陆上的那些商镇,在蒙古劫难后迅

① [英]培根著:《新工具》,格言129条,许宝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速恢复繁荣,中国是它们的财富源头。

在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里,中国是转动世界的轴心。从孟加拉湾一直绵延到鞑靼海峡横贯中亚的大山界限被超越了,东西两个世界进入一个蒙古帝国的版图。蒙古铁骑以战争的方式创造了旧大陆的“世界和平”,人从西方流向东方,物资从东方流向西方。不论是现实中的世界市场还是观念中的世界地理,中国既是这个世界的起点,也是这个世界的终点。蒙古帝国开放了世界,旅行与贸易、观念与知识,都开始了一场革命;全世界都在动,只有中国不动,它是世界的轴心,一个将耗尽自己力量转动世界的、被奴役的轴心。

宋元时代开始,中国的文化国力的影响开始超出东亚华夏文化圈,通过启发西方的现代化运动,最后影响到全世界。马可·波罗那一代人发现世界的最重要的意义是发现中国。现实世界的旅行将商人、传教士等带到中国,是中西交通史上真正划时代的大事。文本世界中的旅行将中国形象带回欧洲,是欧洲文化史上的大事。他们在中国形象中发现了新观念,发现了早期资本主义的世俗精神,中国形象成为财富与君权的象征,不论其经济维面还是政治维面,都表现出欧洲文化的向往。

三

不同文化的交流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中国形象在改变着走出中世纪的欧洲人的观念,甚至诱发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最初的动机与灵感。马可·波罗那一代旅行家发现旧世界的最大意义是发现中国,而发现中国的最大意义是直接导致发现新大陆。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美洲,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用亚当·斯密的话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件事。在这两件事中,有着中国文化形象的影响。马可·波罗时代的大旅行改变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念,使欧洲人意识到他们的家乡不

但不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只是世界的一个偏僻的角落。世俗天堂在亚洲的东部,在富强的“大汗的国土”上。哥伦布远航的动机是寻找天堂般的大汗的国土,整个航程中他都期待着某天清晨,在前方海面上出现汗八里或行在城里耀眼的金屋顶。西方人为了发现一片旧大陆,发现了新大陆;为了发现中国,他们发现了世界。蒙元世纪创造的契丹形象对西方乃至世界历史的创造性影响,在于它成为地理大发现最初的动机与灵感之一。

地理大发现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在进一步理想化的同时,显示出更多的历史精神与道德色彩。门多萨神父的《大中华帝国志》第一次使中国在西方文本与文化中获得了历史化的、清晰完整的形象。它塑造了一个完美的、优越的中华帝国形象,为此后两个世纪间欧洲的“中国崇拜”提供了一个知识与价值的起点。西方文化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召唤与塑造的中国形象,都有一种特定的文化动机。文艺复兴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已不再是一段刺激有趣的传奇故事,对于初入现代文明的欧洲,它将表现为一种改造社会的动力,甚至开始扮演精英文化中的某种社会理想。

令人惊叹的中华文明为文艺复兴文化提供了一个自新与自我超越的楷模。中国形象进一步被理想化,它的文化象征意义越来越丰富,不仅表现了西方现代世俗精神、绝对君权,还开始具有某些政治宗教与道德哲学的启示。中国的司法制度、文官制度与考试制度,中国的圣哲文化与贤明统治,中国的宗教宽容,汉语的普世语言特征与中国人的勤劳,在迈入现代历史的西方文化中都表现为一种特有的、值得赞美与仿效的“中国价值”。大中华帝国的形象,是西方进入现代意识时那种好奇与开放精神的产物。在自尊的谦逊与进取的诚恳心态中,西方需要一个自我超越的楷模,遥远的中国又恰到好处地扮演了这一角色。欧洲将有可能在不同的文明层次上利用中国。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中国形象更加明晰、具体,从民间文化进入精英文化,并带有某些严肃的、激进的色彩。中国形象将成为启蒙运动的一面旗帜。

启蒙时代西方社会文化生活中普遍出现一种泛中国崇拜的思潮,人

称“中国潮”。它将近五个世纪西方不断美化的中国形象推向高峰,中国几乎成为西方文化向往的乌托邦。

“中国潮”既指一般意义上西方人对中国事物的热情,又特指艺术与生活中对所谓的“中国风格”的追慕与模仿。“中国潮”开始于1650年前后,结束于1750年前后。一个世纪间,“中国潮”表现在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从高深玄妙的哲学、严肃沉重的政治到轻松愉快的艺术与娱乐。孔夫子的道德哲学、中华帝国的悠久历史、汉语的普世意义,中国的瓷器、丝织品、茶叶、漆器,中国工艺的装饰风格、园林艺术,诗与戏剧,一时都进入西方人的生活,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模仿的对象与创造的灵感,在欧洲社会面前,中国形象为他们展示了“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①

“中国潮”是那个时代西方人追逐的异国情调的一种表现,没有比中国更遥远的地方,也就没有比中国更神秘、更有吸引力的地方,包括他们的思想观念、人与物产、生活方式。

“中国潮”的发起人主要是商人与传教士。商人们贩运来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在欧洲生活中掀起一股“中国潮”;传教士们贩运回来的孔夫子的哲学与中国的道德神学,在欧洲的思想界掀起了另一种热情,中国思想与制度,成为精英阶层的文化时尚。传教士们从中国回来,便成了社会名流,他们穿着中国长袍,谈论圣明的康熙大帝与玄妙的孔夫子哲学。他们介绍中国的书信在社会上流传,激进主义者感到兴奋,正统主义者感到恐慌。

哲学家们不甘寂寞,也参与到中国哲学是否无神论的讨论中来,有些人甚至冒险思考是否可以用中国道德哲学取代基督教神学。莱布尼茨希望在中国与欧洲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鉴于我们道德败坏的现实,我认为,由中国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运用与实

^① Adolf Reichwein, Kegan Paul, Trench, *China and Europe: 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Contac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rubner & Co., Ltd., 1925), pp. 25~26.

践,就像我们派教士去教他们启蒙的神学那样……”^①莱布尼茨对中国百科全书式的期望,到启蒙时代百科全书派哲学家那里,明确化为道德哲学。伏尔泰准确地发现中国文明在欧洲的利用价值。“……中国人在道德和政治经济学、农业、生活必需的技艺等等方面已臻完美境地,其余方面的知识,倒是我们应该传授给他们……”^②

在西方的启蒙文化中,中国形象逐渐变得丰满、逼真、敏感、有力,那是一个尺度、一种视野,不管你在其中看到威胁还是看到希望,感到恐慌还是感到激动。启蒙哲学家们将中国当作欧洲的榜样——

在推翻神坛的时候,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欧洲暴政的时候,他们运用传教士们提供的中国道德政治与贤明的康熙皇帝。中国成为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

在他们对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又在经济思想中开发中国形象的利用价值,中国又成为重农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楷模。

中国形象不断被启蒙文化利用,从宗教上的自然神论到无神论、宽容主义,从政治上的开明君主专制、哲人治国到平民政治。启蒙哲学家对中国形象的信念,来自于两个基本观念:一是性善论,二是道德理想通过政治权威达成社会公正与幸福。这两个基本观念,恰好又体现在他们构筑的开明的中华帝国形象中。只有哲人政治,才是最完美、最开明的政治。他们在中国发现了哲人王,发现了哲人当政的制度,发现了理想化的伦理政治秩序。这是中国形象的意义,同时也是一些启蒙主义者尊崇的新型的政治伦理社会的理想尺度。启蒙时代西方对中国的开明专制主义的赞扬,更深一层意义是他们发现中国文官制度中隐含的民权、平等观念。在此,中国形象的意义不仅是积极的,可能还是革命性的。中国形象昭示一种与贵族法权相对的平民政治,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些重要观念,如人民、平等,都是杜赫德、伏尔泰、魁奈那一代人在共同人性与世

① 《莱布尼茨和中国》,138、108页,安文铸等编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② [法]伏尔泰著:《哲学辞典》,上册,323页,王燕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界文明视野内从中国形象中植入的。^①

四

中国形象在西方达到高潮,中国的衰落却即将开始。1750年前后是世界文明格局中大国势力均衡的转折期,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殖民扩张使西方文明在历史上第一次胜出东方文明。在西方飞速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相对而言落后了。中国从发动世界的轴心逐渐变成被西方中心冲击带动的世界边缘,它不仅降低了中国的国力,也一度动摇了华夏文化的价值与世界影响。我们承认中国在近代的落后,但是,既不能将这种落后的时段在历史中加长,也不能将落后作为非历史的所谓文明本质在观念中绝对化。

中国在比较文明史视野内的相对落后,并不像流行观点想象的那么久。明清帝国,明富清强。明末中国仍是世界上经济技术最发达、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康乾盛世,清朝的国力并不亚于汉唐盛世,也不亚于正如日中天的英国。马戛尔尼访华时,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实体,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第一,人均收入在平均水平上也不落后于欧洲,即使在启蒙运动的“百科全书”时代,中国出版的书籍总数比整个欧洲还多。康乾盛世之后,中国开始衰落,主要原因除了中国内部的问题,如人口膨胀超出农业经济的限度,帝制周期性的政治腐败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的工业革命打破了世界平衡。落后的原因是封闭。西方中心主义观念总是从自身扩张的角度强调中国的文化自大与封闭。实际上华夏文明不仅不比西方文明更加自我中心、文化自大,明清社会也并不像一般想象的那样封闭。明清间中国内外都发生了一次贸易革命,国内

^① 参见包华石:《“人民”意象变迁考》,载:《视界》,第8辑,3~15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